

国际关系：

呼唤

中国理论

■ 2004 · 上海 · 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

郭树勇 /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

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

郭树勇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郭树勇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9

ISBN 7-201-05121-0

I. 国... II. 郭... III. 国际关系理论—学术会议—文集
IV. D8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573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3,500

定价:45.00 元

序 言

俞正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7年、1998年和2004年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我有幸发起并主持了后两次会议。这三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发展和进入综合、创新的阶段。中国迅速和平崛起,日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必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巨大需求。为此,我们应当具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这已经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在经历一个巨大而快速的结构性转型。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人类与新知识为本、观念与技术不断变革的全球网络时代,全球大变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全球社会正在形成,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尖锐,构成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条件正在悄然发生历史性变迁。民族国家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何处去的问题业已浮出水面。总之,全球化是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国际关系作为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也必然随之发生根本转折。全球化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切入点,研究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根本变革,很可能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的一个历史机遇。

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变化、新走向、新趋势,这一切亟待从哲学高度,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诸方面作出科学解答。时代呼唤着理论创新,呼唤着破除惯性思维。我们既要重视原创性理论建设,又要重视对现有各种中西理论的科学综合。同时,还要从世界历史的新高度,重新估价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及其普世性意义,把它作为创造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源头活水之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创立有四大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中华文化精粹,以及外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它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综合性和实践性,崇尚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和全球中庸主义。理论创新是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工作。凡是

严格意义上的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和合理性。我们要理论创新,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与发展趋势,面对对原有理论的解读。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建设:一是需要有大无畏的开拓者精神,需要有冲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和理论框架的勇气和胆识。要敢为天下先,敢于提出独立的见解,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有深邃、锐利的目光,洞察深藏在表象背后的真谛,由此才能达到理论的突破,这就是理论探索的顿悟。二是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根据全球和中国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用创造性的、更合理的理论来解释它、指导它。三是需要有足够的恒心和韧性。理论创造是一项相对枯燥、抽象的工作,受制于创新能力的强弱和知识的积累,短期内难以出成果。只有宁静致远、淡泊名利、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任何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行色匆忙的学术品格都无济于事。学术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积累和沉淀,而非学术上孤立的感觉碎片。在理论创新的活动中,我们要正确处理确定性和深刻性的关系。作为科学形态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既要追寻确定性,又要追求深刻性。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绝非是建构一种统一的或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取决于不同学派的形成、切磋与争鸣。交流与争鸣是理论发展的最好方式,也可能是惟一方式。揆诸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学派”,主要是指某一特定研究群体,他们研究旨趣相似,理论导向相同,思想倾向相仿,学术风格相近。它是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观察事物视角不同,以及对现实与趋势判断不同而形成的学术派别。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学派之间的互动引发理论创新,学派对于传承学术精粹,凝练学术传统,铸造学术辉煌,造就学术大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代学术发展的复杂性,使得研究模式已由依赖个体能力转向强调个人突破与凝聚群体效应相结合,传统的孤军奋战的作业方式已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蓬勃发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学派密切互动,展开正面的学术批判和交锋。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和众多的战略选择,而且在学术争鸣过程中,各个学派自身也不断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不断演进。这充分证明了学派的巨大优势,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长期缺位,大大延缓了理论研究的步伐,使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严重缺乏学术批判精神和学理分析精神,规范有序的学术批判和争鸣始终难以面世,更何以奢谈学术大师的出现。没有学派,就不可能有大师。

总之,中国国际关系学要尽快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我们责无旁贷,惟有努力前行。

是为序。

2005年3月27日于莘庐

目 录

(1)	序言	俞正樑
	范式讨论	
(3)	全球共治范式初探	俞正樑 陈玉刚
(23)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	梁守德
(35)	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	李少军
	理论争鸣	
(51)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	李义虎
(58)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傅耀祖
(70)	“一条线”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评析	丁诗传 王 超
(85)	世界秩序理论范式的探讨	刘清才 苏云婷 张农寿
(96)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	张森林 吴绍禹
(102)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国际关系思想	耿丽华
(113)	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钮菊生
(121)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石 斌
(133)	历史研究、伦理思考和理论构建	
	——英国学派的思想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启示	周桂银
(144)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问题与思考	方长平
(151)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宋德星
(163)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学派”与“范式”之辨	
	——关于“创建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学派”的几点思考	张建新
(171)	区域认同:国际关系的解读	李明明

(181)	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前提	张志洲
	学科建设	
(193)	关于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陈 岳
(200)	全球政治的要义及其研究	蔡 拓
(212)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创新	仇华飞
(221)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特征	王圣诵 夏兰云
(227)	世界政治的新发展与全球政治学的构建	刘贞晔
(243)	从建构主义的中国化到国际政治社会学	郭树勇
	战略思考	
(263)	和平崛起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项研究议程	赵可金 倪世雄
(276)	试析美国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转换 ——兼谈多边主义在新一届美国政府回归的可能	叶 江
(290)	论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任 晓
(308)	中国战略文化:一项研究议程	门洪华
(319)	论中国和平战略的历史抉择及理论导向	曹泳鑫
(335)	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 ——加强在中亚主动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及值得思考的问题	汪金国 杨 恕
(343)	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	陈向阳
(356)	后记:呼唤中国理论	郭树勇

范 式 讨 论

全球共治范式初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俞正樾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至刚

国际关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期。各个大国以及国家集团正在全力构建在未来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各种非国家力量也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以争取它们国际存在的合法性和应有的生存空间；各种理论供给也层出不穷，力图规范、引导发展的不确定性。总之，我们处在一个旧的体系和观念范式已遭遇挑战，而新的还未能取而代之，甚至是人们对之还未能较为清晰辨识的转折阶段。因此，在这样的时期，建构一种符合国家利益，同时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理论范式就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指导各种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可凝聚人们的思想，形成共识，也可以引导历史的发展，减缓不确定性给世界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正是我们探讨新的全球政治范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宗旨。

我们这里的分析和某种程度的预测建立在这样一对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的分析应基于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完全脱离现实的描绘只能是一种理想，甚至是乌托邦；另一方面，我们的分析又不能完全拘泥于现实，虽然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他也说过凡是合理的就会存在。要进行某种属于未来式的探讨，我们就要确定一些刚刚萌动的因素，只要它合乎历史、世界发展之理。如基辛格所说：“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① 因此，本文的分析由三个部分构成：对范式本身及国际关系范式的一般讨论；对当前国际关系现实与趋势的总体分析；对全球政治新范式的确定。在文章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对思考全球政治新范式所能提供的启示。

①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47页。

一、国际关系范式辨析

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通过研究科技知识发展史而发现的。库恩发现,在知识的发展中,总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能够统领其他知识的概念存在,这样的概念是其他知识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一旦这样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那就是知识世界的革命,如天文学中的太阳中心说对地球中心说的替代就是一场革命。在新的概念统领下,原有的知识或被替换,或被改造。

因此,一个范式性概念的发现和确定,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知识体系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引导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是我们理解整个知识体系及其历史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往往以一个新的范式性概念被广泛接受为标志。

范式是有边界层次的,它既可以是整个人类思想层面的,也可以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的,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是生物学方面的范式,但也可以被看作整个人类思想的范式。这里的知识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领域。学科领域反过来也就成了范式的边界,而边界使得每个学科领域来讨论各自的知识发展及范式革命成为可能。如果再往下继续,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同一学科内部比较相对独立的子知识领域,也存在相对较为独立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而也可以说其具有范式及范式革命的问题。

虽然关于范式概念本身及其存在已取得了广泛共识,但涉及具体领域或某一阶段具体范式概念的认定,就存在不同看法。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史,也有不同的归纳。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相对来说其知识体系的建立比较晚,然而和这一知识体系相应的历史事实,可以说和国家的历史一样早。当然,这是在宽泛的国际关系概念上说的,如果严格地说国际关系就是主权国家形成后才有的,那么这样的历史最多也只是近四百年不到的事。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说,即使当时不存在相应的独立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回头用范式的概念来进行讨论,这并不会影响范式这一概念本身的科学性。而且,这样的做法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库恩发现范式概念的科技史领域,在他之前也不存在范式的概念。

综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范式的存在:自然状态、传统帝国、中世纪主义、主权国家。

自然的国际关系状态是最原始的范式,和近代思想家对自然状态所作的假设一样,在自然的国际关系中,除武力实力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则。这时的国际关系是原始的,也是偶然的。在每一个文明和区域性体系内部,都存在一些比较通行的原则,但不同的文明之间,原则和对话就不存在,或者说原则的碰撞和对话是在战争中进行的。

帝国是古代一种比较主要、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国际关系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其本身自成体系,而国际关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①。因此,帝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自然状态没什么区别,而帝国之内的关系是一种等级制结构,不同的组成部分在等级结构内所拥有的权利和地位不同,甚至不同的个人在这些方面也不一样。在这样的范式下,人们习惯于等级和区别,习惯于在体系内部确定各自应属于的位置。

中世纪主义严格说来只在欧洲历史上存在过。我们这里把中世纪主义作为单独的一种国际关系范式,不在于其宗教意义,而在于其作为一种体系秩序的独特性。第一,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的相似之处,在于体系权力的高度分散,而且只有有过之而无不及,分散得小到一个小庄园都拥有几乎和现在在一个主权国家相似的权力。第二,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不同的是,该体系具有一些大家都认同并在法理上遵守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与封建分封和效忠相适应的一系列原则。第三,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的不同在于,虽然权力高度分散,但权威相对集中于两个角色身上,即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还有一些王国是在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外的,但帝国皇帝的权威名义上所能到达的范围无疑是最广的。第四,中世纪虽然也存在着帝国,但它和帝国范式不同的是,帝国的权威并没有扩展到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帝国之外还存在几个实力强大到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相抗衡的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控制也没有传统帝国那么强,帝国内的等级结构是一种封建分封的诸侯贵族等级结构,而不是传统帝国的官僚统治下的等级结构。^②第五,中世纪除了世俗的普遍权威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精神领域的权威存在,那就是教皇。教会自身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同时它的权力触及并渗透到

①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第5页。

② 传统帝国的内部结构可参见【美】S.N.艾森斯塔得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世俗领域,甚至每一个个人。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国际关系范式是主权国家范式,也可称为威斯特伐利亚范式。主权原则是这个范式的核心概念,它明确了凡是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主体间一律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其他国际关系的所有原则几乎都可把其逻辑根源回推到这一基本原则上。在理论上,这一原则把国际关系推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国家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不一样,自然状态连主权平等这样的基本原则都不存在,而主权范式下的无政府状态不但有主权平等这样的原则,而且其本身就是由这个原则构建的。

这些范式在历史上不是以一个单线递进的方式发展的,在后一个范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前一个范式的痕迹。例如在中世纪范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帝国范式的某种残留,而在主权范式中也同样有帝国范式的残留。不过这样的残留并不影响范式主导原则的运作,因而也可以说范式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基于这样的历史分析和范式界定,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的国际关系新范式的问题,就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范式后国际关系将会是一个什么范式的问题。换言之,一种新范式的认定和确立,就要看主权作为一个核心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替代,新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可。

不过,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范式有时候会在一个知识领域内的相对独立的子领域存在。在国际关系当中,有时候人们会在体系演变意义上来讨论范式问题,例如单极体系、帝国体系、多极体系、二极体系,而讨论国际关系新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构建问题混淆在一起。例如,许多学者会承认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但文明冲突论又经常和其他关于国际关系新秩序问题的讨论被并列在一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新范式的问题目前还无法从超越主权原则的层面来谈的话,那么退一步讲,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从新的国际秩序意义上来讨论这一问题。

二、两种趋势与三种力量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处在一个两种发展趋势激烈斗争的阶段,而且随着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入,这种对立斗争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一种趋势是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另一种趋势是美国的霸权战略,经过冷战结束后十多年的发展,美

国的战略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要构建一个以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①甚至是“新帝国”。这两种趋势之间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多边主义,前者强调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功能,而后者即使承认多边主义的用处,也只是从工具性意义上来看待的。不过,这两种发展趋势中无论哪一种,都对原有的国际关系范式提出了挑战。

在这两种发展趋势的演进中,有三种力量在活动,那就是国家、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

民族国家是传统主权国家范式中的基本行为体和组成单位。根据传统的界定,民族国家是一种集权式的架构,它在西方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向中央集中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结构中,权力的组织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与之相比,中央集权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际关系中,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二者互相规定。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民族国家拥有排他性的权力,虽然也有其他一些行为体在参与国际活动,但从根源上讲,其依据是派生性的,而非原生性的,或者说国家完全可以控制或管理它们的参与活动。因此,尽管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被许多学者单列为一类国际关系行为体,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把它纳入国家的范畴。当然,这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欧盟,它就具有独立于成员国政府的原生性力量,因此它不能被完全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

全球市场的力量在主权国家范式下已获得巨大发展,但真正带有本质性发展变化的则还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市场的全球化和因之而形成的全球市场开始获得其自身的逻辑,呈现出很大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国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在国际上也有了相应的版本。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全球市场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与民族国家并行的一大趋势,但正像国内的市场是无法完全由国家的逻辑所主导一样,全球市场的逻辑也不是国家所能主导和控制的,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全球市场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基本的领域。

全球公民社会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力量,它完全是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的结果。和国内的市民社会一样,全球公民社会也是介于全球市场和国家体系中间,对全球政治具有独立作用能力的一个自主领域。如同约翰·格林所言,“市民社会是一个闯入者,它楔于国家和经济这两大人类生存的组织

^① 参见陈玉刚:《单边主义与美国霸权》,载《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3期。

领域”^①,其作用在于弥补国家与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②不过,这里全球公民社会有时是一种主动的对国家和市场所遗留空缺的填补,有时则以一种反抗和否定的形式来展现,西雅图世贸谈判中所遭遇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可以说是全球公民社会力量的首次强力登场。不过,和国内的公民社会一样,全球的公民社会也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或者批判性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虽然常以一种抗议、批判的形式来展现,例如反全球化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人权保护等,但是这种力量的展现本身也同时说明了它的几个特点:全球性、独立性、非营利性以及非政治权力性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全球公民社会更是一种极具多样性的力量,例如反全球化运动以特殊的方式显示了其作用,他们组织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对抗,并强调“社会化”是“地球村”的基本准则,强烈反对财富集中、贫困与不平等现象的扩散以及少数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

当然这三种力量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国家仍然是最强大、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并左右着大部分的国际活动。全球市场的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譬如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全球市场力量的一个重要体现,有些国家深切感受到了国际资本的游来荡去给它们正常的经济秩序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而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是最年轻的,应该说是20世纪末才初次登场,而且其力量也最分散,这更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三种力量中的相对比重。但是,无论如何,全球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兴的、独立的力量已被人们所认识到。

国家与市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都是独立存在的,拥有自身的逻辑。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决定现代世界国际关系发展动力的关键因素。第一,“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过程”^③。第二,国家是有边界的,而市场是没有边界的。国家基于领土、忠诚和排外性,合法地强制实施公共权力,垄断着暴力的使用权,是“权威的网络”;而市场基于买卖双方效能的结合、契约关系以及发展相互依存,是一个由价格和

① 【美】约翰·格林:《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夏季卷,第159页。

② 参见张志洲:《全球公民社会——克服国际无政府的社会基础?》,载于陈玉刚、袁建华主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时事出版社,2004年。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数量构成的结合,是“交换的网络”。^① 第三,市场生活中的主体是公司,而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则是国家。公司的权力在于可以用资本、技术、服务和管理经验来进入市场,而国家的权力往往可以控制市场的进入。第四,市场运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市场存在失灵的可能,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不是万应灵药,同样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

虽然国家是一种控制性力量,但是在推动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上,市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国际领域中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动力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世界生产力所孕育的市场。市场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它天生具有全球性扩张的倾向。正如布罗代尔所言,欧洲的发展,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② 这种整体性的世界不是语言、文化、信仰和政治制度上的,而是国际分工的协调和世界资源的配置上的。因此,市场运行的趋势与后果是:第一,它使国内市场和地区市场向全球市场过渡,最终使“主要适应于地区或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是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③;第二,它逐步向全球扩散,其扩张趋向超越人为的政治边界,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地域纳入到它的影响范围之内,并在全球确立由市场来组织经济生活的制度。这两种趋势和结果都是与民族国家体制相悖的,造成了国家的政治机构及国家的经济控制政策与世界经济力量之间的根本性分离。说到底,领土边界是国家主权和政治统一的基础,也是国家有形存在的标志,而全球市场最为迫切的是消除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一切阻碍市场运行的政治因素。国家毫无疑问拥有干预国内市场运行的权力,但它却无法拥有左右全球市场运行的能力。对国家在全球行动的最主要限制来自全球市场,因此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全球公民社会思想强调要发展跨国社会力量,直至形成全球社会力量。全球公民社会产生之后,就发生了社会的基本选择问题:占主导地位的究竟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71页。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书店,1996年,第227页。

③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3页。